

北伐相遇

方强(袁文彬)与郭沫若最早相遇于风云激荡的一九二六年。这一年,广州国民政府发动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大革命洪流把这两位热血青年推到了一起。方强和郭沫若同在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简称总政治部)工作,郭沫若担任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袁文彬为宣传科副科长兼文工团(血花剧团)团长。

一九二六年七月,经过五卅运动血与火的洗礼,同济大学学生会主席袁文彬放弃还有两年的医科学业,被中共党组织推荐南下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编入第四期政治科学习,与林彪同期,和袁国平、文强同班。在黄埔军校,袁文彬表现出色,加入共青团。

一九二六年六月,北伐革命战争前夕,袁文彬从第四期政治科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广州国民政府政治训练部(后改组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担任宣传员,结识了宣传科长、主编《革命军报》的李一氓。

在北伐军总政治部,袁文彬认识了他一样戴圆边黑框眼镜、比他大九岁的大诗人郭沫若。他在同济大学时就拜读了这位闻名大江南北、特别在青年中有影响的创造社盟主的著名诗集《女神》(《星空》及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这些文学作品对袁文彬思想进步产生过重要影响。袁文彬和郭沫若一样,原来也是学医学的,不过郭沫若留过洋,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且取得学士学位。

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后,弃医从文,和郁达夫等创造社成员从上海来到大革命中心广州,瞿秋白推荐郭沫若担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北伐前夕,郭沫若又投笔从戎,担任改组后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北伐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郭沫若安排袁文彬代表总政治部和武汉特别市党部妇女部赵晚华,到南昌迎接统率北伐中路军的国民革命军兼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来汉口参加武汉三镇光

复庆祝大会。袁文彬组织北伐军总政治部文工团与武汉三镇妇女协会在汉口新世界剧场联合举行庆祝武汉解放文艺演出大会,受到观看演出的国共两党临时中央负责人及郭沫若、茅盾等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由共青团湖北省委提名,经董必武、吴玉章批准,袁文彬由共青团员正式转为共产党员。

叶挺独立团一举攻克九江、南昌后,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总司令部行营,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要求已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在南昌设立总司令部政治部分部。郭沫若带领袁文彬、李一氓等六名能干而必要的同志来到南昌,在东湖畔江西总商会设立总政治部南昌分部,袁文彬任社会股长,潘汉年任宣传股长,李一氓为秘书长。

北伐军东路军即将攻占上海,根据郭沫若安排,袁文彬从南昌回到武汉,李一氓由九江转回武汉,他们奉命请示武汉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到上海后如何开展工作,怎样应对蒋介石,以及中央对蒋介石的最后决心,这些都要请示明白,总政治部才能开始工作。

郭沫若命令李一氓带领袁文彬等总政治部先遣队沿江东下,来到上海,在西门斜桥路一百六十四号高昌庙制局设立总政治部并挂牌办公。他们找到了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向他报告了总政治部的行动安排。在上海,经李一氓介绍,袁文彬与民主爱国人士、著名实业家、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周善培的女儿周淑贞喜结连理。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查封了总政治部上海分部,逮捕了十九名总政治部工作人员。当时,袁文彬、李一氓等中共党员因参加周恩来在湖州会馆工人纠察队队部,召集到沪各军全体中共党员于部开会而免遭不幸。

郭沫若和党务股长辛焕文从苏州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家日本人开的书店,与袁文彬、李一氓接上头。

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袁文彬精通德文,化名袁持中,受党组织派遣,潜伏上海商务印书馆,以翻译身份为掩护,与武汉革命同志保持联

历史岁月

方强与郭沫若

张汉林

系,做党分派的工作。袁文彬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十年,一直到淞沪抗战爆发。在这期间,他结识了柳亚子、夏衍、阳翰笙等上海文化界人士,翻译出版了《战争》《苏俄妇女与儿童》《德国在哪里去》等德文著作。

抗战重逢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淞沪抗战爆发。

袁文彬在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四处奔走,发动和团结爱国青年与进步文化人士,或撰写文章,或发表演说,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这时,流亡日本十年之久的郭沫若冲破日本政府的重重阻挠,“别妇抛雏”,回国呼吁抗日。曾是创造社成员、时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得知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通知北伐时期的老战友和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与郭沫若见面,并由北伐女兵黄定慧(慕兰)发出请柬,在她家举行座谈会,热烈欢迎郭沫若从海外归来。到会者有四五十人,袁文彬应邀参加。这是大革命失败后分别十年,袁文彬第一次见到北伐军总政治部老领导郭沫若。他们亲切握手、拥抱。袁文彬发现,郭沫若虽只有四十六岁,但两鬓已斑斑白,耳朵有些失聪。袁文彬激动地对郭沫若说:“老领导,你终于回来了,上海文化界急需你担任旗手呼吁抗日!”

郭沫若回到上海时,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刚宣布成立,一致推选他担任救亡协会理事长。第三战区左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要郭沫若以救亡协会名义组织两个战地服务团,分别派到陈诚部和右翼第八集团军张发奎部开

展战地宣传服务。每团三四十人,人选一律由郭沫若决定,生活费及服装均由军部负责供应。很快,郭沫若组织成立了两个战地服务团,派到陈诚部的战地服务团第二团由袁文彬担任团长、翁从六为副团长。

日军轰炸上海“大世界”那天,郭沫若冒着浓烈的硝烟和冲天的炮火,再一次来到法租界金神父路花园坊袁文彬家。袁文彬开门一看,没想到郭沫若这时来到他家,郭沫若进门后,掸了掸长衫上的烟尘,气喘吁吁地问袁文彬:“国难当头,你还不走,是不是舍不得老母和妻儿啊?”

当时,袁文彬不仅有年迈的母亲,还有五个未成年的孩子,最大的十岁,最小的才三岁。日本帝国主义在家门口狂妄滥炸,烧杀抢掠,他早想奔赴前线从事抗日救亡,他向他的妻子表示过,他要到抗日前线去,不愿当亡国奴。郭沫若抛妻别雏,远涉重洋,只身回国呼吁抗日,自己这点困难又算什么。

袁文彬最终“抛妇别雏”,带领战地服务团高唱《战地服务团团歌》,奔赴战火纷飞的昆山抗日前线。

袁文彬出发前,郭沫若借他老乡董竹君开的川菜馆锦江饭店,和北伐老友黄定慧、赵晚华一起热烈欢迎袁文彬重上抗日前线。

袁文彬和妻儿分别那天,孩子们哭喊着,牵衣拦道,有的紧紧拉住他的手,有的一把抱住他的腿,还有的拉扯他的长衫。袁文彬身上的长衫被撕裂了,他的心仿佛也被撕碎了。周淑贞一拉回孩子,孩子们的手从袁文彬的手上、身上轻轻滑落。袁文彬摘下眼镜,掏出手帕,擦了擦模糊的眼睛。撩起长衫,毅然迈向在路旁等待他的军车。他那

撕裂的长衫在迎风飘舞。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生死离别,从此袁文彬再也没有回到过这个家,直至把一腔热血抛洒盐阜大地。

袁文彬出发前,郭沫若就战地服务团组织及经费问题给陈诚写了一封信交给袁文彬,让他面呈陈诚。郭沫若在这封信中称赞袁文彬、翁从六“均有才干,且妥察可靠”。

上海沦陷后,袁文彬率领战地服务团跟随陈诚部撤退到大后方武汉。陈诚将战地服务团改组为政治工作大队,又补充了一些青年学生参加,直属武汉卫戍区警备司令部,袁文彬、翁从六分别改任政治工作大队副大队长。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恢复了北伐时期的政治部,直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陈诚任政治部部长,周恩来为政治部副部长。陈诚邀请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宣传)厅长,主管文化宣传。郭沫若筹组第三厅,急需一大批人才。他得知袁文彬和战地服务团从昆山撤退到武汉后,决定将战地服务团划归三厅领导,把袁文彬调入三厅五处,负责文化宣传。五处即文字宣传处,处长胡愈之,分为文字宣传科、口头宣传科、印刷出版科。袁文彬在文字宣传科担任科员。五处成立了党小组,成员有袁文彬、陈同生、曹荻秋等。

三厅别离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武汉失守前夕,袁文彬带领战地服务团撤往长沙,参加了长沙大火扑灭和善后工作,后经南昌、桂林辗转来到山城重庆。郭沫若和三厅也从长沙经桂林撤退到陪都。政治部对第三厅实行紧缩精简,三厅由原来三处九科紧缩为四个科,取消了处。袁文彬已不能再回三厅工作。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关心和领导下,袁彬告别了老领导郭沫若,带领战地服务团进步青年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从此,袁文彬和郭沫若离别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袁文彬被安排到延安中央马列学院编译室(主任张闻天兼)担任德文译员,与柯柏年、王实味等著名翻译家、作家同事。这时,刚从苏联养伤回到延安

心香瓣瓣

鸡鸣起汲水 日落犹负薪

吴瑛

吃完晚饭,天气晴好,就会出去走一圈。有事耽搁晚了,或者天气不好,就不出去了。

忙到八点才吃完晚饭。车位被外来车辆停掉了,瞅准它离开时,第一时间把车子挪了进来。后座上搬回我的美国乡村鸭。一个大块头的家伙。先生问:“这什么? 阳台已经放不下任何东西了。”

心虚地应着:鸭子。抢先夺过抱着回家。他紧跟后面,重新接了过去。他抱着鸭子爬上四楼,竟气喘吁吁。鸭子明早再安置,这会儿还有其他事。

我坐到餐桌上,放倒所有的笔。让他把那个拍照用的大灯移了过来。我的眼睛,还好使。看笔尖,一支支看过去。他拿了个放大镜,一支支照,然后

生活故事

陌路里相逢

春桃

下班后,我骑着电瓶车回家。在路另一侧,有一个骑摩托车的中年人和我相向而行。即将“错过”时,他突然很大声地朝马路这边大喊:“前面施工呢,不要走啊!”他的话音一落,这边的行人也纷纷慢下来,还没等我们开口问个究竟,那男子像一阵风,飘然而去。

经过短暂的考虑之后,我调转车头,向另一条路走去。但也有一些人没有理会陌生男子随口而出的“忠告”,仍按原路继续前行。下午一上班,我就听见有人抱怨那路的确很难走,后悔没有听那男子的话。

虽然我没有看清那人的面容,但我想,他一定是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

那天,我在街上闲逛,忽然从我身边过去一个骑电动车的年轻人,他刚过去几米远,一串钥匙“啪”地掉在地上。他也意识到了,把车刹住。我紧走几步,把钥匙捡起来递到他手里。他愣了一下,然后很客气地朝我微微一笑说:“谢谢你!”这样的小事似乎不值一提,但那一天,我整个人都喜滋滋的。

一位女同事曾经跟我说过一件她亲身经历的事。那年冬天,她坐火车出差去北京。不巧天降暴雪,火车无法前行。在被困了十个小时之后,肠胃不好的她又冷又饿,此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喝上一杯热水。可是车

在墨水瓶上,滴了两滴黑墨水,我看过他的笔,他拿着一支支蘸墨试写。边讲解:这支有点刮纸。我答,那给它写顺滑了呀。他应着:可是,不刮纸了,它的笔锋就没有了。那怎么办呀? 他应:世事两难全呀,你把它打磨顺滑了,它怎么能八面出锋呢?

又是一课了。奶奶在自己的房间里睡了。中途醒来,嘀咕着:“这么晚了,还在忙。”

鸡鸣起汲水,日落犹负薪。说的是古人的生存模式。一大早起来,先要提水,把水缸灌满水。太阳落山了,得背一挑子柴火回来,来日才能吃饱一日三餐。

任时光怎么改变,人活着一天,就要劳作一天。只是汲水负薪的活儿,变了个花样。

秋天的乡村

吴小平

鸟语花香

锁不住人们对乡愁的思念

纷纷自驾体验乡情

秋天的乡村

乡愁溢满我的心房

温暖我的记忆

带着我去寻找故乡的方向

故乡的老屋风车炊烟河流

乡村的田野故乡的人和往事

处处留下我童年

片片温馨的回亿

秋天的风景一阵慢一阵

吹散一地枯叶

带走我的一片记忆

秋天的雨又紧跟下起来

润色着平原大地

我站在故乡的田埂上

听小鸟在晨曦中唱歌

庄稼的汉子在田埂上忙碌

望着笑弯了腰的稻子

指挥联合收割机

收割风吹稻浪翻滚的稻子

为了乡村振兴

美丽的乡村建起崛起

你贡献自己的智慧力量汗水

浇灌着在希望的田野上

秋天的乡村

多愁又善感

我望着故乡的风景

一遍又一遍念着故乡的名字

秀美又温暖又魅力

秋天的乡村

风景美如画

一直装在我心中萦绕



古镇夜景

董华鸿 摄

杂谈随感

大国工匠国脊梁

陈伟

庸之辈。

道虽迹,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学习是一个终生的任务,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学习书本知识,学习他人的长处,学习失败中的经验教训,学习认识社会的方方面面,让弥补学后的不足成为乐趣,因为那是在完美你自己。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心似平原走马,易放难收。面对高科技不断发展创新的新时代,面对新难题和新挑战,我们只有不畏其难,乘势而上,才能有所作为,才能取得在工作学习中的更大进步和发展。

1914年冬,梁启超先生到清华大学作了一篇题为《君子》的演讲,希望清华学子能继承中华传统美德,引用了《周易》上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话语来激励清华学子。此次演讲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被铸入校徽,高悬于大礼堂的上方,成为师生共同遵守的校训,被清华学子沿用至今。

“自强不息”就是要求学子要有奋发图强,勇往直前,争创一流的品格精神,如梁先生所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学者

立志尤须坚忍强毅,见义勇为,不避艰险”。

植物中有一种落叶灌木,花淡红色,生在花托内,外面不易看见,所以叫无花果,果实由肉质的花托形成,扁球形或卵形,味甜可以食,也可入药,是一种深得人们青睐的植物。大国工匠正是这一种无花果,他(她)们并非所有人都持有高端名校的文凭,而是凭着一股执着的爱国情怀和刚毅的韧劲,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孜孜以求,大胆创新,眼光独到。正如五代旧唐书所言:“随事制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师古?”“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真理长河中有无数礁石险滩。只有不畏攀登的采药者,只有不怕巨浪的弄潮儿,才能登上高峰采得仙草,深入水底觅得骊珠。”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得金;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宜守不移之志,以成可大之功。正是这些名德重塑的大国工匠为中华民族留下了辉煌,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其丰功伟绩将名垂千古流芳百世。

日常生活中,文凭是通往成功的方便之门,但绝对不是保证成功的基石,当代的大国工匠源于自身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才可有所建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昙花虽美,只是一现而以,最后无果而终;鲜花再美,若缺少肥源,疏于浇灌修剪,势必过早凋谢、枯萎,只有朴实的松柏四季常青,郁郁葱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岂不更妙,大江东去,浪淘尽,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